

任侠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任侠者

孙云○著

任侠



孙云，男，汉族，1976年生，

宁夏西吉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2010年1月至6月），现任教于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共党史研究。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近20篇，参编教材1部。



责任编辑：郭永顺 杨海军
封面设计：白雅丽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任侠者

黑白之间

长久以来，游走于黑白世界的侠客，被我们“神话”成世间公平、正义、良知的最佳化身，在他们的身上，承载了数千年专制社会下弱势群体太多的利益渴求与美好愿望。但是，无论是从具体的历史长河来看，抑或就武侠文学的理性分析而言，侠客们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真正“救世主”和“良心”。事实上，民众应有的权利保障之路还须依赖于社会的真正转型。

ISBN 978-7-227-04929-6



9 787227 049296 >

定 价 28.00 元



黑白之间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任侠者

孙云◎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白之间: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任侠者 / 孙云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227-04929-6

I. ①黑… II. ①孙… III. ①中华文化-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4164 号

黑白之间——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任侠者

孙 云 著

责任编辑 郭永顺 杨海军

封面设计 白雅丽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书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8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9230 印数 1000 册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929-6/K·653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爷爷和我的导师常金仓先生

自序——我的侠客梦

和大多数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孩子一样，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练就绝世武功的大侠。那样，便可飞檐走壁、来去自如，实现打抱不平、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侠行壮举。更为重要的是，胆敢有坏人欺负自己，定打得他满地找牙，叫他吃尽苦头。其后，伴随着 80 年代以来各类武侠小说、电影、电视剧的盛极一时，这个“痴梦”一直做了很多年。犹记得，“小人书”系列中海灯法师的侠胆慈心(《海灯法师》)、杜心武的豪爽率直(《南北大侠》)、大刀王五的义薄云天(《大刀王五》)等，这都给成长中的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此后初中阶段大量武侠小说的阅读，愈加使我对行走在江湖世界中的他们，艳羡不已，恨不得自己身处其中(这可能就是时下所说的“穿越”方式之一种吧)。梁羽生、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的作品，总是塞填在鼓囊囊的书包中，甚或就压在上课课本的下面，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养分”，“daydream”式地臆想着这些作品中描绘的江湖世界。打打杀杀、爱恨情仇、英雄救美、江湖大义等主题的渲染，更使得我常常不能自己，为主人公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扼腕叹息，对他们的侠肝义胆和表现出的任侠大义钦佩得五体投地。不惟如此，一

段时期内,除了与“志同道合”的武侠迷们互换书籍、共同交流心得体会外,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学着好勇斗狠的侠客们,有了各自的帮派与“圈子”,并开始苦练自己瞎想的所谓“功夫”,五花八门,“拿来主义”,甚至有人还想尽办法多处去拜师。而我缠着母亲,让她给我做了一副绑腿的沙袋,据说每天带着它,可以练就一身轻功。遗憾的是,一周之后我即放弃,因为如果再绑着它,我连放学后走回家的劲都没有了。

高中的紧张生活,并没有冲淡萦绕在心头的侠客梦,周末或假期的休憩,时不时将一整块的时间让渡给了武侠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对于不同的武侠小说,开始有了“挑食”习惯,但无论如何,我对江湖中行侠仗义的他们,始终充满着无以言说的钟爱和崇敬,大有一种“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大学学业结束时,我选择了继续上学,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化史,导师常金仓先生是位道德文章的学者典范,他视我们这些门下弟子如己出,手把手地教我们读经典、学理论,那些佶屈聱牙、艰涩难懂的古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苦读了三年,钻研了三年,临到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我与众不同,研究的兴趣点落在了历史上真正存在和影响甚深的侠客们身上,我知道,那是我的心结。但有意思的是,造化弄人,正是从这个研究开始,我发现我的侠客梦与我渐行渐远。原来,历史上真正存在的那些侠客们,并不像某些小说家所言,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也更不是整个社会价值标准和道义的最后坚守者。他们或为政治权力场斗争中的一工具性人物,或为民间自组织的强权人物,并时常违法乱纪,凭一己喜好断人生死。虽然他们通过暴力复仇和民事调停,以及政府之外的私力救济方式,弥补了传统帝国统治措施的

许多缺漏和不足，但究其实质，他们构成了正常社会和政府之外的亚社会组织形态，其行事标准和道德准则有悖于日常社会，因而，它的存在，弊大于利。

基于此研究认识，再反观我十几年来的侠客梦，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任侠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看似绚丽多姿的精神“罂粟花”，它既会让孩童们迷恋于此，更会成为成年人恒久咀嚼的童话与美梦。它真实地反映了传统时代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权利无助时的一种无奈“情结”，即在困厄之际寄希望于能及时出现超级“拯救者”。但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在一个没有真正法治实现的社会里，仅凭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发愤一击”，是不能保障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实现的。换句话说，民众普遍渴求一个大侠出现和侠行高唱的社会，恰恰证明了它法治的不成熟和道德转型的不彻底。

是为序。

目录 Contents

自序/我的侠客梦

第一章 早期任侠风气生成的文化考察	001
一、有关侠起源的几种代表性说法	001
二、早期任侠风气生成的文化要素分析	006
三、墨家学派与任侠者的关系	033
四、任侠者的社会来源	036
第二章 任侠精神的最初形成与确立	040
一、朋友有信	040
二、士为知己者死	042
三、临危受命、以救时难	045
四、节士不以辱生	047
第三章 汉代任侠者的组织化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050
一、西汉政权的建立者属任侠者团体	050
二、王侯权贵及地方豪强与任侠者的相互勾结	052
三、名利的驱动与任侠者的组织化	057

四、汉代已降任侠者的组织化进程与流变	068
第四章 武侠小说发展谱系	082
一、先秦到两汉的侠义文学	082
二、武侠小说的成熟期	084
三、武侠小说的第一次高潮	085
四、武侠小说的第二次高潮	091
五、金庸、梁羽生与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崛起	097
第五章 中国侠文化的审视与思考	105
一、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05
二、侠文化的实质	115
三、侠文化对当下的影响	118
四、如何有效地防范侠文化的负面效应	135
附 录	
一、《告别史学的“政治情结”——从“三年之丧”起源 问题谈起》	138
二、《任侠文化是一把双刃剑》	159
三、《春秋战国时期任侠风气与法治关系的文化 考察》	171
四、《终日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略论阮籍及魏晋 名士的政治心态》	186
后 记	196

第一章 早期任侠风气生成的文化考察

闻一多先生曾借英国人韦尔斯的话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①这个土匪，就是任侠者的影子和历史衍生物。那么，中国古代的侠风起于何时？它又是基于怎样的社会文化要素产生、发展乃至流变的呢？这些任侠者和墨家的根本区别又有哪些？要较为全面、详尽地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先从侠的起源问题说起。

一、有关侠起源的几种代表性说法

“游侠之风，倡自春秋，盛于战国。”^②有关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兴起的前期研究，著述颇丰，成果也层出不穷。但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放置在历史的具体大环境中进行考察的却并不占主流。简言之，众多学者研究的聚焦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史书所记载的最直接、最明显的游侠群体上，尤其关注故事细节和发展，正如常金仓先生所言，这些“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史出于对细节的追求引发了重材料轻理论的倾向，出于对

^① 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②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3页。

过程的追求必然引起对‘起源’的浓厚兴趣”^①。对游侠起源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大体说来，各家说法可归纳为六类：

1. 侠起源于士阶层。这种观点又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侠是士阶层中武士与文士分途后，逐渐从武士中发展演变而来。顾颉刚、冯友兰、吕思勉均持这种观点。^②这种说法带有普遍性，屡见于各类教材书刊。第二种意见认为侠不过是士阶层中最下等的“恶霸”人物。范文澜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③

2. 侠起源于某一学派。章太炎等认为侠起源于儒家的一支。他说：“漆雕氏之儒废，而闾里有游侠。”^④梁启超说：“漆雕儒”是“后世游侠之祖也”。^⑤另外，有许多学者认为侠起源于墨家。鲁迅、闻一多、吕振羽、侯外庐等都持这种观点。^⑥但察于史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有些学者在反对这种说法的同时，努力调和二者意见。譬如钱穆道：“故谓侠出于儒、墨则可，谓儒、墨分文、武，而以墨擬侠，则皆不得古社会流品之真相也。”^⑦蒙文通也说：“墨固侠而儒亦侠。”^⑧

① 常金仓：《论现象史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② 顾颉刚：《武士与文士之蜕变》，《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第89页；冯友兰：《三松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20页；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17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6页。

④ 章炳麟、儒侠：《訄书详注》，徐复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⑤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88页。

⑥ 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5页；闻一多：《关于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55年，第136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7页。

⑦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释侠》（二），《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台北），1996年，第289页。

⑧ 蒙文通：《漆雕之儒考》，《古学甄微》，巴蜀书社，1987年，第208页。

3. 侠的起源跟儒墨无关。郭沫若便说：“又有的朋友说：墨家并没有亡，后世的任侠者流便是墨家的苗裔。这也是乱认表亲的办法……然而儒墨自儒墨，任侠自任侠，古人并不曾混同，我们也不好任意混同的。大抵在儒墨之中均曾有任侠者流参加，倒是实在的情形。”^①

4. 侠的兴起是社会变革中民间社会秩序进行调整的结果，属于“新型人际结合关系的性质”。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就是这样认为的。^②

5. 当代部分学者将游侠的兴起，归因于“传统文化大系统中两个相反相成的文化子系统”的出现。简单地讲，即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对存在导致的结果，而侠的产生是根基于下层民间文化的需要。张未民、陈山皆如是说^③。

6. 郑元春认为，“侠起源于原始氏族的遗风”，“原始正义观念是侠意识观念的渊源和基础”等。^④

上述六种具有代表性的提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 20 世纪关于游侠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侠的产生，绝不仅仅限于某个阶层或学派，也不完全是民间社会秩序变动带来的直接后果。要知道，任侠现象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这体现在社会各个层面。同时，任侠者的身份也极为复杂。上有卿相之侠如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下有操持贱业以求生计，活动于市井

^① 郭沫若：《青铜时代·墨子的思想》，《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1 卷），人民出版社，第 484、485 页。

^② [日]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 3 卷，上古秦汉），中华书局，1993 年，第 529 页。

^③ 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1992 年，第 2 页。

^④ 郑元春：《侠客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第 275 页。

之中的“闾巷之侠”，如魏国大梁夷门监者侯羸、属狗者朱亥、赵国的博徒毛公和卖浆者薛公、燕国的屠狗及善击筑者渐离、节侠田光、卫国论剑者荆轲、杀人避仇逃往齐国的鼓刀屠者聂政，以及织网贩草鞋的齐人北郭骚等。简单地将侠的产生归于两种相对文化子系统的出现，实际上是借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误读。不难看出，这六种看法除对历史作了一点似是而非的解释外，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特定时代产生这种社会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研究缺乏真正的历史感。在今天看来，关于侠士起源问题之所以意见如此分歧，大抵由于研究方法的简单肤浅导致了片面的结论，未能将这一特殊群体纳入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中作具体的分析考察，这是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水平低下产生的必然后果。20世纪学者对春秋战国至秦汉间任侠风气的研究，存在着以下两大思想误区：

1. 对这个时期的任侠风气的考察仅限于其中的部分人物或个别群体，没有将他们放入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宏观地、全局性地把握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我们认为：现象是社会成员，至少是某地区、某阶层、某团体成员行为中显示出来的共相，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事件，抑或某人或某几个共同参与的一个独特事件的过程。同时，基于现象本身的相对稳定性、普遍性，使得我们能够对它进行科学的处理，从而从那些反复重现的现象中归纳出事物的原理来，即通过对现象的科学分解，去发现历史的通则、原理或规律。^①

2. 前人多喜欢对任侠者的行为进行价值和道德的臧否评

^①常金仓：《论现象史学》，《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判。梁启超撰写的《中国之武士道》即是代表作品之一。他在该书的“自叙”里这样写道：“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名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呜呼，我同胞，兴！兴！兴！汝祖宗之神力，将式凭焉，以起汝于死人而肉汝白骨。”^①他希望借助古人的任侠尚武精神，激发起消沉麻木的中国人的斗志，达到救国救民的政治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被梁氏大力表彰的游侠群体，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又成了众矢之的。吉书时先生曾对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关于游侠研究的大部分文章作过统计与分析，并且指出：这些文章的论点“集中于游侠的阶级属性”分析，不是称侠是儒的帮凶，便说侠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②由此可见，这种以教化或训诫，乃至影射为目的的政治史学，不但对史学研究无补，而且试图假历史维持世道人心又显得过分苍白与无力。就像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批判的那样：“有些人借口编历史，像法官似的到处奔忙，到这里来判刑，到那里去赦免，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历史的职责……这样一些人一般是被认为缺乏历史感的。”^③正是这种研究的错误导向与研究方法的非科学性，作为特殊时期特殊文化表象的任侠风气，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科学研究。

^①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86页。

^② 吉书时：《试论西汉的侠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③ [意]克罗齐：《作为自由的故事的历史》，转引自[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82页。